

全球化时代东亚的 制度变革

宋志勇 郑蔚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全球化时代东亚的制度变革

宋志勇 郑蔚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时代东亚的制度改革/宋志勇, 郑尉主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 -7 -201 -07083 -4

I. ①全... II. ①宋... ②郑... III. ①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东亚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东亚 IV. ①F131②D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021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1 印张 2 插页

字数: 600 千字 印数: 1-2,000

定 价: 68.00 元

总 序

2007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给当今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东亚也不例外,它促使我们不得不对全球化与地域发展的关系重新进行思考。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东亚国家为了应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冲击,开始了近代化改革,一百多年从未间断。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新的全球化浪潮,东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变革。在应对全球化的诸多变革中,制度变革是重要内容之一。

为总结全球化与东亚发展的经验教训,探讨以制度变革为中心的全球化时代东亚改革、发展的道路,2009年9月13—14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在天津召开了“全球化时代东亚的制度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名古屋大学、早稻田大学、韩国高丽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等中日韩三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余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与会代表分别从经济、政治与外交、法律以及文化与教育的角度,以制度改革为中心,探讨了东亚区域及东亚各国应对全球化的改革。本论文集即是在参加此次会议代表提交的论文基础之上,经过会后作者进一步修改后汇集而成的。

一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其发展要受市场力量、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面性,即利益与风险并存、机会与挑战同在。本次国际会议就“全球化时代东亚的制度变革”这一论题,从全球化时代东亚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征、全球化与中国的崛起、金融危机对策与东亚金融改革、全球化与日本的行政及财政改革、

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政策与企业经营、全球化进程中的日本农村社会及农政改革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论证。

名古屋大学的平川均教授在其《全球化与东亚格局变化》一文中强调了构建东亚地区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为有效防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在一国建立国际化制度与区域经济体系的协调机制十分重要”。着眼中日两国在地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平川均教授还指出:两国更应该在强调“民间互信”的基础上,超越财富与力量的较量,从本质上追求本国与区域内的繁荣。吉林大学的张亲培教授就“全球化时代的东亚经济发展政策转型”问题阐述了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政策转型的过程来看,目前已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转变为“更加倚重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的经济发展政策”,同时,政策权威也从“政府”分散到“社会”,实现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逐步占据首要地位的“政策理念”转型,这一论点充分强调了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他还指出了政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即从政策转型的成效上看,前瞻性与预见性不足,今后还应该更好地应对政策的创新性和持续性较弱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关权教授的研究则将着眼点放在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的崛起”,探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产业社会形成”的具体轨迹。他提出: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与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差距逐渐缩小。与此同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改“国营”和“集体”二元经济模式,初步形成民营、私有经济、外国资本等并存的多元化格局并走向成熟。经济格局的改变催生了中国“产业社会”的形成,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和实施的方向。关权教授进一步剖析了“产业社会”形成过程中“改革与开放”、“政府与民间”和“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开放比改革更重要,民间的作用大于政府,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雷鸣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日本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的经验,提出了日本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是由战间期、战时统制期、战后改革期和战后复兴期四个历史时期共同组成的所谓“四阶段论”,指出存在于政府、财界、企业、银行间的“组织化”是日本战后经济体制变革的最重要特征。

金融衍生品的风险效果通过全球化被进一步放大了,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证实了金融危机的全球联动效应,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了重大冲击。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就金融危机的对策与东

亚各国金融改革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日本早稻田大学池尾爱子教授通过自身的亲历感知,解读了此次金融危机中存在于美国国内政府及民间的“反对金融管制”论调的具体危害,提出“外压”——即“在中长期制度改革规划中导入适当的规制”不失为应对金融危机的良好对策,并提出从社会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说,导入并实施必要的管制措施必不可少。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郑蔚副教授的论文对比分析了爆发于上世纪末期的日本金融危机与此次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美国金融危机的不同对策与教训,认为银行主导型与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制度在金融体系功能上均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但都不能单独完成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金融功能,必须增强二者的互补。同时,在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将根据自己的目标和传统进行金融体系的重建,无论是直接金融还是间接金融,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形式,各国均会产生不同的自然实践,其中,日本构建市场型间接金融体系的做法将对各国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陈虹教授的论文以“景气循环的顺周期增幅效果”为切入点,论证了日本积极应对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作用和意义。陈虹教授认为,日本在监管改革中较为突出的做法是,以维护宏观信用秩序的稳定为核心,争取对实体经济的打击最小化,特别是日本政府注意到了当危机爆发时,金融中介职能瞬间瘫痪,原有的金融监管规则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景气的震荡幅度,加剧了景气循环的顺周期增幅效果。为此,陈虹教授继续指出,今后,日本应对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将在预防与应对两个领域做出努力,最终目标是为稳定实体经济提供必要的保障。

复旦大学副教授戴晓芙的《日本“新金融框架”与不良债权的治理分析》一文,对2002年10月日本金融当局出台的旨在根治银行坏账、促进银行改善经营的“金融再生计划”的实施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评价,认为日本金融不良债权治理成功,除一些外部因素外,日本金融当局在注巨资稳定金融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的强化监管与治理的组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政府注资施救产生的“改善银行财务的直接效果”,二是金融当局强化注资银行纪律约束和竞争体制建设产生的“改善银行财务的间接效果”。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周仪论证了金融制度改革与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的职能及作用变化的关系,认为日本政府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生的泡沫经济进行反思,从中得出仅赋予日本银行独立性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彻底改变其金融政策的制定方式,彻底改变日本银行内部管理决策机制的结论,提出修改后的《日本银行

法》在赋予日本银行独立性的同时,改变了过去日本银行内部双重决策结构,提高了政策委员会的地位,使它成为日本银行最高经营决策机构和最高政策决定机构。

与会专家还就“全球化与行政财政改革”的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论证。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的杉浦势之教授针对全球化背景下日本行政财政改革的历史意义阐述了其独到的见解。杉浦势之教授认为,由全球化而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英美两国的战略,它为对抗日德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强化衰弱的国际竞争力为目的,旨在通过民营化实现效率最大化或是通过弱化工会来确保工资的灵活性,它尚不适合目前仍未实现全面福利化的日本。他进一步提出,目前日本经济存在的问题不仅限于增长停滞、国际竞争力下降,而是由于“老龄化”与“少子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日本丧失了支撑其经济高速增长基础的人口增长,这也是东亚各国同样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日本的行政财政改革应该从亚洲整体的增长战略中重新审视并赋予其新的含义。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的伊藤真利子以“邮政民营化”为实例,论证了日本行政财政改革的本质特征。她认为,日本的邮政民营化改革是在全球化引起的巨大制度变革中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环被强制推行的,在其推行过程中不乏存在旨在瓦解以往的特定邮政体制的政治意图。同时,邮政民营化改革不同于以往的民营化改革,它并未强调促进产业的提升,相反政治色彩较为浓厚,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行政财政改革一环的邮政民营化的进程将在整体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实现超越其政治意图的更为深远的效果。海南大学的云大津博士在《日本行政与财政改革中的“电电公社”民营化案例研究》一文中,以日本著名的大国企“电电公社”为对象,对其民营化改革过程及其改制效果进行了翔实的介绍和分析,指出了全球化背景下日本及东亚 IT 产业的特点。

“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政策与企业经营”是我们在探讨全球化时代经济体制变革中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此次国际会议就这一论题展开了充分论证。日本法政大学经营学部教授洞口治夫从“对中国政府的国家经济战略的反应模式”角度针对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及其相关的经济政策对日本企业行为及其在华企业经营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与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等政策相呼应,到中国投资的日系企业接连受到中国国内通货膨胀和外汇不足的影响。他指出日元升值时期日本对华投资十分活跃,且与地方政府的投资优惠政策相呼应,推进了中国国内的城

市化进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由日本到中国”的全球化作用;但同时还应看到全球化作用的反作用或许会以“过剩”投资的形式导致风险的积累。日本三重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经济学科深井英喜副教授的报告以《全球化、日企变革及其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化》为题,揭示了新世纪以来形成日本劳动力市场流动化的主要原因,指出它不仅导致了日本经济增长体制及分配结构发生变化,也滋生了围绕资本积累而在劳资间产生的阶级对立的问题。深井英喜认为,面对全球化竞争的压力,日本如果采取以牺牲国内劳动力市场来确保收益的策略,将会加剧其社会目前面临问题的严峻性,将会导致劳资间的利害关系变得更为尖锐。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十河孝雄教授通过对日本汽车产业对海外企业投资活动与中国汽车产业国产化政策的分析认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希望包括零件在内的汽车产业国产化,为此不断寻求从发达国家持有必要技术的企业进行资本和技术的转移,中国在加入 WTO 后,其汽车产业政策逐渐向依据国际通商规则方向转变,中国未来产业政策的不透明性仍将继续决定日本企业投资行为的变化。

本次会议还就“全球化进程中的东亚农村社会及农政改革”等方面对东亚的农业和农村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论证。岛根大学生物资源科学部谷口宪治教授在题为《从“农村经营”的视角探讨东亚农村振兴政策》报告中阐述了全球化时代日益严峻的农村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模式与背景,以中日韩三国为例探讨了全球化时代东亚地区农村的异同点,认为应正确评价东亚农村所蕴藏的人力物力资源,使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东亚农村带着固有问题向前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何维持和发展东亚农村和农业将成为当地全体居民的重要课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温娟副教授以“面向 21 世纪农政改革”为背景,探讨了全球化进程中日本的农地政策变革,认为自农地法成立后日本农地制度政策虽经历了数次改革,其频度不断增加,但终究无法摆脱“自耕农权利保护”与“创造适应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农业构造”这两种理念的困扰,政界虽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民主党政权下的农业、农地政策的变化,将是未来讨论的中心,新农政必将经受愈加高涨的全球化浪潮的考验,这也将关系着日本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影响着 WTO 农业谈判的走向。

二

全球化对东亚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界,而是全方位的。它迫使东亚各

国在政治、行政、法律、外交、文化各个领域进行应对,开展以制度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综合改革。

复旦大学郭定平教授在《制度改革与意外后果:日本发展模式转型的政治学分析》一文从制度改革角度对日本发展模式转型进行了政治学分析,认为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创造发展奇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日本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结构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促使日本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直接推动了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与此同时,原有模式的一些特征依然残存,新旧模式转换过程中矛盾和摩擦大量出现,模式转型危机重重。制度改革带来的这些意外后果,致使日本在应对危机和模式重建过程中步履维艰。对于其前景,他认为发掘日本传统的优势制度资源、精心设计各种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继续推动制度改革依然是日本政治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

解放军外语学院教授徐万胜在《冷战后日本的政治资金制度改革及其影响》一文中,从政治资金的视角,概述了“1955年体制”形成与崩溃的原因,并着重对冷战后日本政治资金制度的改革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提出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治捐款的减少与政党交付金的导入,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治资金收入结构最显著的变化。同时,在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的转型过程中,现存的政治资金制度仍是有利于执政的自民党的,但政治资金制度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非法行为,必然导致朝野政党间的抗争不时加剧。

南开大学的乔林生副教授在《试论日本“世袭政治”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中,从制度层面对日本的世袭政治久盛不衰的原因进行了解剖;并指出世袭政治是影响日本民主政治的一大顽症,世袭政治的减少或消除有赖于以能力本位、政策本位的政党制度框架的形成,有赖于日本民主制度的完善。在当今的转型时期,只能是通过政党之间的角逐,提高政策力度和行政监督,逐步完善日本的政治体制。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许晓光《日本维新前后政治制度和权力起源学说的变迁》一文,对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政治制度和权力起源学说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指出德川幕府时期流行朱子学宣扬的政治制度“天造”学说,而后期的水户学对“君权神授”观念的宣传,将制度和权力“天造”的学说推向极至。但随着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社会剧烈变化,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起源学说也发生了转变。徂徕学提出了“人为制作”的学说。近代早

期的日本思想家们受徂徕学和西方近代化政治学说的影响,探索了有关国家权力起源的各类学说,并明确否定了流行千年的政治制度天然形成或君权神授等观念。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教授江藤俊昭的《全球化时代的日本政治制度改革——以地方分权改革为中心》一文,透过对全球化背景下日本进行的地方分权改革的分析,表明了日本政治制度改革的艰巨性,指出在促进自治运动的推动下,日本的地方自治体无论从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了地方政府。这种变化是第一期地方分权改革的结果。而当前进行的第二期改革存在着两条改革路线,一条是缩小国家干预、扩大自治体自由度的路线;另一条是下放国家直辖事业给自治体的路线。地方分权的阻力仍然很大,需要地方居民坚持不懈的努力。

北京大学的白智立副教授《从中日公共行政比较看中国“地方分权”改革的特质与未来》一文通过比较,主要考察了中国的政策转型与“地方分权”改革、中央优越体制的形成与“地方分权”改革问题的特质、政府体系结构与中央地方关系现状以及从中日公共行政比较看未来的中国“地方分权”改革等四个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作者指出分析地方治理制度以及中央地方关系的比较公共行政研究,或者在此基础之上的制度的模仿或创新,对于构想今后的中国地方治理制度以及对新型的中央地方关系进行制度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进而言之,对于转变“放权”、“收权”、中央集权、地方变通抗争的中央地方传统关系结构,从而更好地展望未来的中国“地方分权”改革意义深远。

南开大学的王蕾副教授在《战后日本的行政改革与首相权限的强化》一文中,对日本自1952年重获主权至今进行过的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改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指出纵观历次改革,尽管中心与重点各有不同,但每一次都与强化内阁或首相的权限有关。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两次改革,更以强化首相权限及其支持机制为改革核心。同时,改革的结果也使得战后日本的行政体制呈现出首相领导权与首相官邸日益强化的总体趋势。

全球化对东亚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厦门大学张光教授《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基于村委会选举调查的实证研究》一文,通过对关于农村居民对村委会选举公平性的情景实验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程序特征和分配公平对公平观的影响力,数倍大于与己有利的结果的影响力。作者由此认为,中国的基层政治民主化具有公民政治文化基础。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从代表成员看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现状及课题》一文,对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由此入手,对全国人大制度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展望。

复旦大学的贺平在《日本的东亚合作模式研究——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一文,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对东亚区域合作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不同阶段提供了各具形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这成为日本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和实现自身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途径之一。为了实现最优供给模式,日本经历了从单向供给到机制建设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日本分别遵循“开放的地区主义”和“竞争性合作”等原则,处理和协调与域外大国和域内大国的关系,并通过“加权总和”和“最优环节”等主要供给方式力图缓解战略意图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

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安藤次男《经济、政治与文化交错的日美关系——以20世纪80年代末的FSX问题为例》一文,对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FSX问题与日美关系的深层构造进行了分析,认为FSX问题并非当时人们所说的单纯的经济摩擦问题,而是经济摩擦、军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纵横交织、错综复杂的问题。FSX事件虽然已过去20年,但这种复杂构造的本质并未发生任何变化。日美同盟关系虽然没有改变,但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20世纪90年代的“忽略日本”(Japan Passing)→21世纪的“无视日本”(Japan Nothing)的过程。

南开大学的尹晓亮博士在《构建国际环境秩序中的共识》一文中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构建国际环境秩序的必要性 and 国际社会达成认知共识的紧迫性以及上述努力的困难性进行了论述,指出人类如何在对气候变化及其危害的认知共识基础上,通过具有约束性的减排框架,构建公平、合理、可行的国际环境秩序,是需要人们深度考量的重要命题。

全球化的浪潮对经济、对东亚传统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也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为适用全球化的进展,东亚各国在政治与法律领域也进行了和正在进行相应的改革,意义深远。

中国传媒大学的魏晓阳博士在《日本隐私权宪法保护制度变革》一文中,从隐私权的理论论证、从私法到宪法保护的隐私权司法实践、宪法隐私权的含义和权能属性、隐私权与表达自由的冲突与协调四个层面,论述了战后日本隐私权从制度上受到宪法保护的发展过程,指出日本隐私权的宪法

保护深受美国的影响。在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发展过程中,隐私权从私法权利发展为宪法权利;适应信息社会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隐私权的客体内容从私生活自由扩展为包括个人信息自决权;隐私权的权能属性从消极扩展为积极。在这一过程中,司法判例和学术研究的相互推动对于日本法制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诸多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熊达云教授在《日本刑事审判制度的重大改革——裁判员审判制度的建立》一文中,对2009年5月以后开始实施的裁判员审判制度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指出它已经对日本社会、尤其是对刑事审判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社会上对其褒贬不一。从积极的方面看,裁判员与法官一起参与审判,可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使司法更趋公正、公平和效率。从消极方面看,由于裁判员更易受案件案情以及社会舆论和被害人情绪的影响,刑事判决出现了严判趋势,这一点似乎已经得到了部分验证。对于这一新的制度改革,作者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并预测日本社会对这一制度将抱着一种喜忧参半的审慎心情,进一步密切关注其实践进程。

自古以来,共同创造东亚地区的社会繁荣成为具有相邻的地域关系和相似的人文传统的东亚各国的共同目标。与会专家和学者还从社会文化及东亚教育的国际化等视角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论证。

韩国高丽大学教授崔官在《全球化时代的东亚文化研究》一文中,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与文化新概念、东亚中心时代的到来、东亚世界的变迁和东亚三国文化研究的前景四个方面阐述了全球化时代东亚文化的特征和前景。他认为广义上全球化时代以特定的国家和民族为主体所进行的全部活动,是一条追求人类文化的道路,21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也是“文化时代”。崔官教授认为,在世界的“东亚时代”来临时期,从文化视角对东亚进行重新定位和制订新的区域目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东亚教育的国际化,其中中日留学交流引人注目。日本樱美林大学教授李恩民和日本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常务理事今西淳子在其《中日留学交流30年:留学理念的变迁与全球化时代的对应》一文中,回顾了中日留学交流30年的历史和留学理念的变迁,归纳了中日留学交流理念的三部曲,即中日留学交流的基本理念——学习先进与留学支援、中日留学交流新理念的确立——产业化理念、民间的留学交流理念——文化载体理念。对于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以什么理念、用怎样的文化魅力来吸引东亚区域内外的外国留学生的问題,作者认为至少应该把握以下两点:一是在东亚区域内,高扬文化载体理念,大量派出和大量接收外国留学生;二

是在东亚区域外,展示东亚文明的特殊性。对于中日高等教育界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浪潮,南开大学教授宋志勇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日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以重大国家工程为中心》一文中,对中日两国实施的“211工程”与“985工程”、“21世纪COE工程”与“全球化COE工程”进行了评述,对其在推动新时期中日高等教育发展上发挥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韩国高丽大学副教授金津日出美提交的《“国史”的“消亡”?——韩国开设“东亚史”课程的前景》一文,以韩国新近设置“东亚史”为线索,对全球化背景下东亚的学校历史教育进行了探讨,让我们看到了东亚史教育“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本次“全球化时代东亚的制度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在学术交流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功,也为增进东亚各国间的相互认识和区域间合作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会议共提交了35篇论文,中日韩三国的学者围绕全球化背景下东亚的制度变革及其他相应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既有取得共识的观点,也有意见相异的课题,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他们认真思考我们居住的东亚问题的重要成果,现推荐给读者,希望能为推动东亚地区的学术交流和区域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编者

目 录

总 序

全球化与东亚格局变化	平川均(1)
全球化时代的东亚文化研究	崔 官(16)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产业社会的形成	关 权(24)
全球化时代的东亚经济发展政策转型	张亲培 王哲夫(39)
美国始发的金融危机及其对策	池尾爱子(53)
景气循环的顺周期增幅效果:日本积极应对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陈 虹(64)
理解金融危机:爆发与救助的日美比较	郑 蔚(79)
日本“新金融框架”与不良债权的治理分析	戴晓芙(93)
金融制度改革与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变化	周 仪(105)
从“农村经营”的视角探讨东亚农村振兴政策	谷口宪治(119)
全球化进程中的日本农地政策	温 娟(134)
日本行政财政改革的历史意义	杉浦势之(148)
日本行政与财政改革中的“电电公社”民营化案例研究	云大津(151)
日本行政财政改革之邮政民营化的实例	伊藤真利子(180)
从中日公共行政比较看中国“地方分权”改革的特质与未来	白智立(189)
战后日本的行政改革与首相权限的强化	王 蕾(202)
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 ——对中国政府的国家经济战略的反应模式	洞口治夫(218)

全球化、日企变革及其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化	深井英喜(230)
从“市场化”到“组织化”	
——对日本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的历史考察	雷 鸣(241)
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企业投资活动与中国汽车产业国产化	
政策	十河孝雄(257)
制度改革与意外后果:日本发展模式转型的政治学分析	
.....	郭定平(268)
日本的东亚合作模式研究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	贺 平(285)
全球化时代的日本政治制度改革	
——以地方分权改革为中心	江藤俊昭(303)
冷战后日本的政治资金制度改革及其影响	徐万胜(314)
试论日本“世袭政治”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乔林生(326)
日本维新前后政治制度和权力起源学说的变迁	许晓光(342)
从代表成员看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现状及课题	
.....	村田忠禧(354)
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基于村委会选举调查的实证研究	
.....	张 光(372)
日本刑事审判制度的重大改革	
——裁判员审判制度的建立	熊达云(392)
日本隐私权宪法保护制度变革	魏晓阳(415)
中日留学交流 30 年:留学理念的变迁与全球化时代的	
对应	李恩民 今西淳子(428)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日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以重大国家工程为中心	宋志勇(443)
经济、政治与文化交错的日美关系	
——以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 FSX 问题为例	安藤次男(455)
构建国际环境秩序中的共识	尹晓亮(465)
“国史”的“消亡”?	
——韩国开设“东亚史”课程的前景	金津日出美(472)

全球化与东亚格局变化

平川均

前 言

现在正流行用“新词”来反映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BRICs”一词自 2001 年最早出现以来如今已经成为常用词语。美国投资银行高盛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4 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超过 G7。BRIC 正是由这 4 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英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组成。高盛在 2005 年又创造了 N-11 这个新词,以表现有可能紧随上述 4 个国家之后的安哥拉、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越南(O'Neill 2001; Wilson & Purushothanman 2003; 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 Group 2007)。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在 2008 年版的贸易投资白皮书中用“JETRO16”(JETRO - File Increasing - Interest Countries 16)一词来表示“被高度关注的 16 个新兴国家”(JETRO 2008:77—78)。这也是使用新词对新概念进行表述的又一次尝试。

“新词”现象的出现理所当然,因为这个时代涌现的新事物层出不穷。就战后经济而言,NICs(新兴工业国)、NIEs(新兴工业经济)等新词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这些词汇的出现与这些国家及地区实现了惊人的发展密切关联,而此次新兴经济体的诞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原有的先进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格局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的破产引起了世界金融危机。危机后,BRICs 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正在迅速提高。2009 年 6 月,BRICs 四国在俄

罗斯的叶卡捷琳堡首次召开了正式的首脑会议,在转年的7月利用拉奎拉首脑会议(意大利)的机会,除了G8成员的俄罗斯之外的BRICs成员国再加上南非和墨西哥,召开了G5首脑会,并发表了声明。声明的内容要求改变以G8为主导的世界格局,并且表明了参与到解决全球化问题中去的积极态度。

但并不能把目光仅停留在此,而是要考虑产生这些现象的背景和意义。当把BRICs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时,就会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了新的变化。本文将探讨东亚格局的变动、BRICs的发展及这些国家的成长对现代资本主义乃至对资本主义史的意义。

一、东亚格局的变动

(一) 经济实力的收敛现象

在日本经济产业省2009年版的通商白皮书中这样写道:如果中国的增长率是8%,日本是负3.5%,就GDP的规模而言“在2009年可能发生日本的逆转”(经济产业省2009:341)。中国从1978年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融入了世界经济。这一发展不仅深化了东亚地域的区域内贸易,并且让世界看到了作为“世界工厂”的东亚正朝着具有独立性的经济圈方向发展。本节对这一现实作一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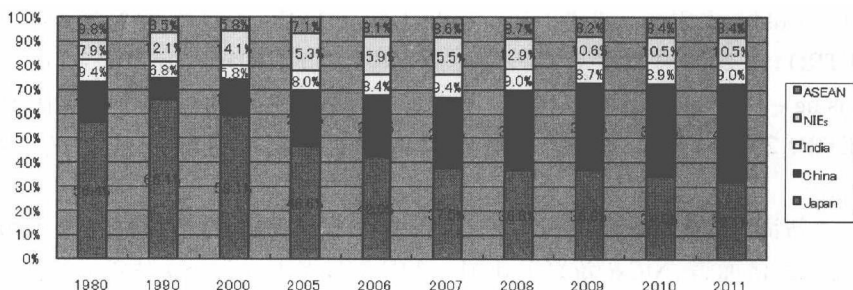


图1 各国集团占东亚+印度的GDP合计的比例
(East Asia + India's share of GDP) 1980—2011

注:2008年以后是根据IMF的推测。

资料来源:根据IFM(2009a)做成。

首先,考察构成东亚的日本、NIEs(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ASEAN和中国,然后再加上印度的扩大的东亚(100%)。如图1所示,日本